

# 延安文艺 精神永存

肖云儒

##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讲话精神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一脉相承，作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历久弥新。为了更好的落实讲话精神，在此特刊登我省著名学者肖云儒教授此篇研究思考，以飨读者。

“延安文艺”作为一种文艺现象，一般特指从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中央离开陕北这15年中，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内的革命文学艺术。它不但在空间上超越了“延安”，在时间上也超越了“延安”。它早已成为一种文艺精神、文艺现象、文艺传统的代称，远远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空。

“延安文艺”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全面奠基的时代，延安文艺座谈会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隆重的奠基礼，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指导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整个

进程的元典思想。“延安文艺”不仅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史的开篇和结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一章。

文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使命。文艺为先进的社会使命服务，不但不会损害它的美学价值，倒是会大大提高它的美学价值。这种服务越是自觉、越是艺术，文艺的美学价值就越能得到充分实现。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延安文艺”最值得重视的价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极大地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国文艺永恒的路标。我们不妨把

“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简明地提炼为三句话，即：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这是一条通过与人民结合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延安文艺”在实践中勘探出来而由《讲话》在理论上总结出来的。这个永恒的命题，是“延安文艺”生命之所系，也是一切文艺生命之所系。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文艺如何变化，“人民文艺”这一基本精神是常青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文艺”运动指导性和总结性的文件。他在这个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该成为人民文艺，“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从“延安文艺”运动鲜活的实践出发，从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使命入手，对历史实践主体与艺术创作主体的关系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人民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最终选择，也是艺术的最终选择。文艺的美学价值最终体现为文艺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历史实践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业绩和主动性，以及他们在历史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形象——性格、心理、感情、情绪等等。这既是作品社会价值的核心，也是作品艺术魅力的根由。

文艺如何将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延安文艺”和《讲话》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出—条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子，这便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然后进入创作过程。欧阳山、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这条路子，长期在农村、部队生活，和人民大众—

道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体察他们当家作主的心态和感情，才写出了《高干大》《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塑造已经成为历史主人的新的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开创了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之先河。

文学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既是历史实践主体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又是以艺术劳动的分工来为人民大众整个历史创造活动服务的特殊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应该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书记员，更是历史实践主体美学形象的创造者、精神世界的发现者和传播者。人民的艺术形象，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艺术形象，能否在心灵的和审美的进程中确立，有赖于作家、艺术家的劳动。因而文艺归根结底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情绪。文艺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就是这样辩证地统一在为历史实践主体——人民大众的服务上。

《讲话》进而提出，作家、艺术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有一个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的问题。艺术劳动既然需要创作者心灵和感情的大量投入，艺术创作主体和历史实践主体如果在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上差异很大、隔膜很大，要正确、深刻地传达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很难的，要服务也是服务不好的。这样毛泽东提出了要改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大众不熟不懂的状况，要深入生活和群众结合，学习他们，描写他们，同时教育他们和提高他们。

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讲话》紧紧抓住“人民”这一核心价值，由此出发，展开论述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作家世界观的改造、文艺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指导人民文艺发展的思想体系，引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人民文艺实践。这使“延安文艺”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当代人民文艺的渊藪和圭臬”。

历史上一切进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情绪保持着某种深刻的联系。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过去要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上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难度。是马克思主义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马恩和列宁都在这方面做过明确而精到的论述。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人民群众的文艺实践还不够丰厚，人民群众的文艺运动还没有兴起，经典作家的思想也就没有赶上和人民文艺的实践完美结合的历史机遇。“延安文艺”运动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美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文艺观得到了创造性发展。《讲话》的理性精神通过大众化的“延安文艺”运动，转化为整个社会的艺术行为，在千百万老百姓的实践和心灵中开花结果，乃至造就了一个中国文艺的灿烂时代。

## 二

每一项社会实践，每一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留给历史的都有几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实践的、物质的、理论的既在性内容，其次是含纳在某项社会实践或物质、精神成果中的结构性内容，再次是实践主体或创造主体固化在某项社会实践活动或物质、精神中的特有的情绪心理内容。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宏大的思想解放和革命实践运动，留给历史的不止是它所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想文化内容，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准备的历史社会性内容，也含纳着一种启开精神枷锁、融会中西文化的思生结构、思维方法，还有启蒙救亡、铁肩担道义的人生

激情。历史会一页页翻过去，但蕴含于其中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激情则会永远给人们以启示和激励。

我也是从这几个层次来理解“延安文艺”和《讲话》的。“延安文艺”和《讲话》留给历史的，既包含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和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延安文艺”的成功实践；也包含着毛泽东在提出、阐述他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思维结构和创造性思维方法，以及流贯于“延安文艺”运动中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极富创造性的情绪状态。这几个层次，都是《讲话》留下的精神财富，在过去70多年乃至今后，都会对我国的文化艺术深远地发挥作用。

在三个层次上，“延安文艺”和《讲话》的内在气质都是开放、开拓、创新的。

从既在性内容的层次看，“延安文艺”和《讲话》的历史首创精神和思想启蒙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使命的关系、对历史实践主体与艺术创作主体的关系，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并用艺术实践做了验证。如前所述，这种解答是反映论的，又是辩证法的。古往今来，能够将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解答得如此深刻而又浅显，如此具有普世意义而又有中国特色，恐非“延安文艺”和《讲话》莫属。

二是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入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现实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这一精神创造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张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延安文艺”和《讲话》反复强调并印证了这一观



点。问题不止于此，当历史发展到了人民大众已经由被压迫被剥削者翻身做了主人，而且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开始有了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时，社会生活新的根本性的变化，必然产生新的美。如何将这种新的生活美（包括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图画）转化为新的艺术美，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他们能以建立新的人民文艺为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宝库做出新贡献的历史机遇。

### 三

从结构性内容这个层次看，“延安文艺”和《讲话》在文化结构、思维结构和思想方法上，多方面表现出创新和开放特色。

《讲话》在通篇的论述中体现出一种多维的文化结构和开放的思维结构。这不仅与毛泽东本人的文化构成和思维结构有关，也是延安文艺运动、延安文化人乃至我们党整个领导层文化构成和思维结构的一种聚光。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年轻时代又大量阅读了《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哲学、经济学著作。青年时代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革命现实斗争的结合。为准备《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界做了大量的调

查研究，研究中外哲学和美学，重读《鲁迅全集》，读俄国民主义批评家“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

杜勃罗留波夫）的论著。知识结构的多维给思维结构的开放以重大影响。所以在《讲话》前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能光演边区创作的节目，也要演国统区的、外国的节目。他首先提议演《雷雨》，不久，《带枪的人》等不少中外名剧相继在延安上演。

从延安当时的文化环境来看，也是比较开放和重视融汇的。且不说“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以西洋文学的输入而开始的”（周扬）这样一个五四以来就形成的大文化背景，就拿陕甘宁边区来说，文艺工作者相当一部分是从沦陷区、国统区聚汇而来，其中不少人在欧美和日本、东南亚学习或生活过，直接受过西方和东方文化的影响，他们构成边区传播和应用世界文化的重要因子。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性决定了中国抗战文艺的世界性，延安是中国抗战文艺的中心，中国抗战文艺是世界反法西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延安文艺”在精神上、题材上、艺术追求上与当时的世界文化有着血缘的联系。

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结构，是《讲话》唯物辩证法理论建构和思维方法的重要成因之一。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文艺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以此为立足点来解决其他问题，在论述各